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7

2007年2月1日

對晚清軍事改革者的分析及啓示¹

軍事科學院 皮明勇

研究歷史有很多的視角，不同的視角能夠發現不同的問題，觀察到不同的深度，探尋到不同的啟示。任何軍事變革都要靠人去推動，對改革者的觀察和分析，就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能夠幫助我們比較好地把握軍事變革的歷史特點規律，從中感悟出更多、更深刻、更有教益的歷史內涵。

晚清 70 年，先後發生了兩次大的軍事變革浪潮，出現過四批軍事改革者：第一次變革浪潮，發生在洋務運動時期，又稱軍事自強運動。推動這次軍事變革運動的有兩批改革者。第一批主要是林則徐、魏源等人，他們在鴉片戰爭之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由於清廷對此反應冷淡，“師夷長技以制夷”僅停留在思想層面，

¹ 本文為國防大學授課提綱 — 編者註。

雖然有少數官員和讀書人附和，但總體上是雷聲不大、雨點更是沒有。第二批改革者包括恭親王奕訢，地方督撫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一批洋務思想家等，隊伍要龐大得多。他們繼承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並做了比較系統的發揮，使之有所深化和具體化。在他們的倡導和主持下，軍事自強變革作為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終於得以展開。運動的重點是創辦兵工廠，興辦軍事學堂，為湘軍、淮軍換裝洋槍洋炮並改用西式訓練，以及建立新式海軍。這場變革持續 30 年，清政府投入很大，一度搞得有聲有色，但最終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它的結束，而李鴻章等改革者也因此落得灰頭垢臉。

第二次軍事變革浪潮，發生甲午戰爭之後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之後，同樣也出現過兩批改革者。第三批是甲午戰爭之後，也就是戊戌維新時期，由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成，他們借戊戌維新的大勢，積極推進軍事變革，最基本的主張是改革軍制、創練新軍。這批改革者直接捲入了當時激烈的政治鬥爭，在慈禧等人發動政變後，或被軟禁，或被革職通緝，有的甚至還被殺頭。當然，在這批改革者中，也有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他們在軍事上主張改革，在政治上站在慈禧太后一邊，成為戊戌政變的得利者，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加入到第四批軍事改革者的隊伍中。第四批軍事改革者，除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外，還有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滿族新貴，以及大量的留日學生。這些人所推動的新軍編練運動，從甲午戰爭後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之前，聲勢很大、影響很大，代表了晚清軍事變革的最高水平，改變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也改變了很多改革者的命運。

總的看，晚清兩次軍事變革呈斷續性發展態勢，幾番潮起潮落，在總體上推進了中國軍事近代化，但過程曲折，而且伴隨一次次戰

敗辱國，最終結局令人失望。如果我們走近晚清軍事改革者，近距離地對他們進行觀察，我們將能夠更好地認識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進行改革受到什麼力量的驅使，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的改革思想存在什麼樣的局限，是怎樣影響晚清軍事變革的，從而深化對晚清軍事變革的認識。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對晚清軍事改革者進行分析：一是從思想決定行動的角度，分析晚清軍事改革者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結論是：思想走多遠、行動才可走多遠；二是從軍事改革者群體結構入手，分析改革者在清朝軍事體制中的不同地位以及他們在軍事變革中扮演的角色，結論是：軍事改革既需體制之外的動力，更需體制之上的駕馭；三是從改革的動力機制的角度，分析晚清軍事改革者到底受什麼驅使投身軍事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結論是：改革者離不開愛國激情，更離不開利益的驅動和文化的激勵。

一、思想走多遠，行動才可走多遠

任何一場軍事變革，都不能缺少改革思想家。他們的思想代表著變革運動的靈魂，有什麼樣的改革思想，才有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改革行動。

（一）思想的基點，決定著行動的重心

在晚清前後四批軍事改革者中，前兩批改革者的思想認識總體上處於同一個水平上，其核心都是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改革思想的基點，決定了洋務運動時期軍事自強變革主要圍繞“製器”、“練兵”的主題來展開。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第一代改革思想家林則徐和魏源首先提出的，特別是魏源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魏源在《海國圖誌》一書的敘言中說：“是書為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

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認為，夷之“長技”主要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他提出的具體改革措施也有三條：一是在廣東虎門的沙角、大角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聘請法國、美國技師傳授製造船炮技術；二是選福建、廣東駐軍官兵，聘請外國艦船管駕官傳授駕船演炮方法，學習西方軍隊的海戰技術和戰術；三是仿照西方國家養兵練兵之法，對清軍進行精選、優養、勤練和嚴節制。

洋務運動時期出現的第二代軍事改革者人數比較多，最著名的代表要數恭親王奕訢、總督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這些人把自己所倡導的軍事變革稱之為“自強”，而核心思想仍然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奕訢說：“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李鴻章說：“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莫若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左宗棠說：“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必傲以無也。”他們的具體改革主張重點是：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如江南機器製造局、福州馬尾造船廠等，製造新式槍炮輪船器械；在八旗、綠營中抽出一部分較為精壯的兵丁編組“練軍”，從湘軍、淮軍等營勇部隊中改編一部分防軍，在清朝舊有水師之外單獨編練新式海軍，其中包括北洋艦隊。

正是第一代與第二代改革者的這種思想認識，決定洋務運動時期軍事自強變革實踐的重心，始終不出“製器”、“練兵”四個字。創辦兵工廠是用以生產堅船利炮；培養軍事人才的重點，是讓他們掌握製造和使用先進武器的技術和方法；翻譯西方軍事著作，所選擇的主要內容是有關輪船槍炮製造技術和使用方法的；將八

旗、綠營改編為練軍，將湘軍、淮軍改編為防軍，最重要就是為它們換裝洋槍洋炮，同時改用西式訓練。這些活動在性質上都屬於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範疇。

稍有例外的是，清政府在編練新式海軍時，因為無成例可循，仿照和採用了部分英國、德國海軍制度。《北洋海軍章程》“大半採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處，或參仿德國初式”。然而，即使是北洋海軍，最終也仍然被納入清朝舊有的軍事體制和政策制度的大框架之中。在指揮系統方面，其防守基地和海口炮臺的部隊，屬於陸軍系統，不受北洋海軍提督指揮，無法形成統一的指揮體系。其艦隊編制，沒有按艦船本身性能進行合理編組，而是將整個艦隊編為右翼、左翼、中軍、後軍四隊，仍是舊編制的翻版。在官制方面，則是按借用綠營官制，劃分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九等。在兵役制度方面，仍然實行募兵制，沒有建立現役與預備役結合的近代兵役制度。

（二）思想的局限，導致行動的失敗

洋務運動時期的軍事自強變革歷史表明，如果改革者沒有在思想上取得突破，就不可能在變革實踐中辦成大事。

對於晚清軍事改革思想家來說，謀劃軍事變革主要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如何適應和推進軍事技術的快速進步；二是如何掙脫舊體制、舊制度的束縛，實現軍事體制機制的創新。前一個問題屬於比較單純的技術問題或軍事問題，後一個問題則是嚴肅的政治問題。面對單純的技術問題或軍事問題，軍事改革思想家們完全可以找到新的出路和辦法，真正的考驗不在第一個問題，而在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在軍事制度創新問題上，特別是與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緊密關聯的軍事力量體制創新問題上。在這方面，洋務運動時期的軍事改革者們大都顧慮重重，前怕狼、後怕虎，即使有人偶爾冒出新

的思想念頭，也不敢正面向朝廷提出。其結果，他們的改革思想被嚴格禁錮在“中體西用”的框架之內，極大地制約了軍事變革實踐的發展。

1877年，清朝派往英、法的首任公使郭嵩燾從倫敦致書李鴻章，提出：學習西方不能祇講求軍事技術，應當把目光轉向西洋政教風俗等“立國之本”。李鴻章答稱：“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親至其地，然留心咨訪考察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言下之意，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然而，他言鋒一轉說道：“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據說李鴻章曾想部分改革清廷中央軍事體制，如改兵部為陸軍部，使之與1885年設立的海軍衙門並立。他在給朋友信函中說：“兵制關立國之根基、馭夷之樞紐，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祖宗之成法？”可是，他卻長期把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直到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才對慈禧太后說“六部誠可廢”。至於應當如何確立全國軍隊的近代化統率體制，他始終也未敢明言。

應當說，李鴻章是中國近代一個十分矛盾的人物，他的內心充滿了彷徨和苦悶，但不管怎麼說，他的軍事改革思想存在著嚴重的局限。當時的一些改良派思想家對這種祇強調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改革思想提出了明確的批評。1884年鄭觀應說：“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製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難臻富強。”

在不敢觸動“中體”的條件下，李鴻章等人的軍事改革思想被限制在“師夷長技”的範圍內，他們所進行的軍事變革實踐，也祇能是圍繞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來“製器”和“練兵”。這樣的做法，違背了軍事變革的規律，有悖於時代潮流，必然以失敗而告終。甲

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全面軍事變革打敗了僅限於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局部軍事變革。

（三）思想的飛躍，推動行動的突破

甲午戰爭之後，新一代的軍事改革者，對李鴻章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們僅僅關心學習船堅炮利之事，而不太注重學習西方的軍事制度。黃海海戰失敗後，“鎮遠”艦槍炮官曹嘉祥、守備饒鳴衢在總結教訓時說：“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以禦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成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朝制所限，所以難以盡仿，所以難操勝券也。”

這一時期的改革思想家康有為，對洋務派軍事改革主張提出了更具理論性、也更為深刻的批評。他說：“今數十年諸臣所言變法，率皆略變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體，又所謂變法者，須自制度先為，法律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批評李鴻章等人祇變事不變法，可謂正中要害，觸及到問題的根本。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要對洋務派的軍事改革思想實現雙重超越。第一重超越，就是不僅要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更要學習西方的軍事制度。第二重超越，不僅要學習西方的軍事制度，更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在著名的《公車上書》中向光緒皇帝提出，要“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他的所謂“練兵”，主要包括：仿效德國、日本，改革軍隊體制編制，實行精兵政策；推行徵兵制，實行“舉國為兵之制”；鼓勵民間發展軍事技術，改良軍隊武器裝備；廢除武舉，廣設軍事學堂，造就大批新式軍官；重振海軍，恢復海權。他的所謂“變法”，不僅要講究富國之法、養民之法和教民之法，更要改革官制，實行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如果對康有為的軍事改革思想

進行概括，可以說他的核心主張就是“既變事更變法”。

康有為並不能算是晚清軍事改革思想家，但他的軍事改革主張卻有開先河之處，並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逐漸得到更多人的贊同。當時，廣大留日學生紛紛參與討論中國軍事變革問題，他們所重點強調的兩個主張就是：第一，全面改革中國傳統的軍事制度；第二，把中國軍事制度改革特別是軍事領導體制改革納入整個國家的議會民主政治改革之中。

從甲午戰爭時開始到辛亥革命爆發，其間十餘年，清政府大規模編練新軍。新軍到底新在哪裡呢？不是新在它的武器裝備，因為甲午戰爭前的清軍裝備也大多是洋槍洋炮，新軍裝備祇不過是好一些的洋槍洋炮而已。新軍之新，一是新在它的制度，包括編制制度、軍官制度、兵役制度、訓練制度等等，都基本是以德國、日本的軍隊為藍本。二是新在中央軍事領導體制發展上，1903年中央設練兵處，1906年將兵部改為陸軍部，將練兵處併入；1910年設海軍部；1909年設軍咨府，相當於總參謀部，基本實行了軍政、軍令分開。

這從另一個方面告訴我們，對於軍事變革運動而言，祇有思想前進一大步，改革實踐才有可能跟著前進一大步。

二、改革需要體制之外的動力，要有體制之上的駕馭

分析晚清前後四批軍事改革者的群體結構，可以看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軍事改革思想家往往來自軍事體制之外；另一方面，祇有體制之內的實權派才能有效領導和駕馭軍事變革。

（一）軍事改革思想家首先出自那些既接觸軍事又不受體制約

束的人

晚清軍隊興替頻繁，但新老軍隊的官兵基本上都沒有比較強烈的軍事改革衝動。八旗、綠營官兵不用說，湘軍、淮軍官兵也不用說，就是晚清海軍以及後來的新軍，也幾乎無人提出過有價值的軍事改革主張。究其原因，首先是清軍官兵的文化水平程度較低，難以對軍事變革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更重要的是，清朝對軍人有嚴格的紀律規定，強調軍人作為武裝集團的一分子，要以服從為天職，不容許他們有求異的思維，有深刻的思想，這就使他們不可能開風氣之先，成為軍事變革的思想家和倡導者。清末新軍第九鎮駐南京，它的官兵文化程度是當時各路新軍中最高的，統制徐紹楨曾發文告誡其官兵：“軍人本分限制甚嚴，一經投筆從戎，無論為官長為兵士，皆當專心軍事，祇知崇奉一神聖不可侵犯之紀律，而不得稍有旁騖。”可以說，清軍官兵很少有機會成為軍事改革思想家，特別是難以成為思想先行者，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以執行命令的方式參加到軍事變革的行列中來。

晚清時期，能夠有機會成為軍事改革思想家，特別是成為思想先行者的人，一般都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有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有敢於批評、善於批評的思維品質；二是有機會接觸當時的軍事問題，能夠感受到現實的刺激，同時把握住問題的癥結；三是人在體制之外，有一定的思想自由空間。晚清湧現出來的那些開風氣之先的改革思想家，基本上都具備這幾個條件。比較典型的是魏源和康有為。

魏源，湖南邵陽人，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生。他的經歷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他28歲成舉人，曾在北京當過小官（內閣中書舍人），專管抄寫機密文書，得以大量閱讀各種官書和私人著作；二是鴉片戰爭爆發後，他曾專程赴浙江前線，就近觀察戰事，

後又與曾親自主持廣東方面對英作戰準備的林則徐結識，深入交換過對軍事問題的看法；三是他始終沒有當上大官，一生主要以讀書、教書、寫書為事，是典型的中國傳統“三書”人士。正是這些條件，使他能夠成為“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的提出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1858年（咸豐八年）生。他出身宦宦之家，自幼聰慧過人，五歲能背唐詩數百首。他主要居住在廣州，但交遊甚廣，在1895年提出他的變法主張前，已是兩遊香港、一遊上海、五上北京。他十幾歲開始接觸介紹西方政治軍事讀物，20多歲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維新變法主張，30歲時開始以平民身份向光緒皇帝上書。他在科舉考場上一路跋涉，一開始並不順利，秀才考了三次，舉人考了四次，到他1895年組織“公車上書”時還祇是一個舉人身份（當年成進士）。這種特定的經歷，決定了康有為的思想非常活躍，而且是以政治的視野來審視軍事問題，從政治變革的高度來考慮軍事變革。因此，儘管他的軍事變革主張並無新奇之處，但由於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具有特別的時代價值，從而賦予他的軍事改革思想以一種特別的意境。

（二）地方督撫主導的軍事變革必然呈畸形發展

晚清兩次軍事變革運動的實際主導者大都是地方督撫等實權派人物。洋務運動時期軍事自強變革，主導者：曾國藩，兩江總督；李鴻章，直隸總督；左宗棠，閩浙總督；丁日昌，福建巡撫。甲午戰爭之後的主導者：袁世凱，直隸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轉湖廣總督；劉坤一，兩江總督。為什麼晚清督撫能夠成為軍事變革運動的主導者呢？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能較好地接受體制之外的改革思想，又具有體制之內的權力。

第一，他們有機會較多地接觸西方先進軍事，接觸晚清軍事改革思想家的思想，逐漸形成自己的軍事改革主張。這些督撫絕大多

數都起家於太平天國戰爭，經歷過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熟知清朝軍事問題，見識過外國軍隊，對中外軍隊的強弱優劣有較深刻的認識。在他們身邊，集結著一批有思想的讀書人，或充幕僚，或為門客，或成摯友，他們深受這些人思想的影響。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有許多關於軍事變革的奏摺，其實就是他們身邊的思想家們替為起草的。我們今天在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的個人文集中，還可以找到他們當年為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起草奏摺的原稿。

第二，地方督撫具有文武雙重身份，擁有軍事、財政、人事三重權力。按清朝官制規定，總督是從一品文官，兼部兵尚書銜，掌一省或數省的文武、軍民，是轄區內最高軍事統帥。巡撫是正二品文官，兼兵部侍郎銜，總管一省的軍民事務。在晚清朝廷衰微、地方權重的格局下，總督、巡撫既握有軍隊指揮權，又對地方財政經費分配和人事安排具有很大的自主權。三權合一，意味著他們手中掌握了推進軍事變革所必需的資源。這一點非常重要和關鍵，是他們能夠主導晚清軍事變革最重要的條件。

在當時的外國人的眼中，李鴻章曾經是清政府中最有權勢的人。有人這樣形容他：“入朝為宰相，在軍為元帥，臨民為總督，交鄰為通商大臣。”也有人稱他為“東方俾斯麥”。以他這樣的權勢，祇要他願意搞軍事變革，肯定能夠有所作為。實際上，建立江南機制製造局這樣晚清最大的兵工廠，創建北洋海軍這樣龐大的新式海軍，在甲午戰爭前也祇有李鴻章等人才辦得成。袁世凱在編練新軍時曾算過一筆賬，組建一個鎮的新軍，最少需二百萬兩白銀，北洋六鎮新軍，僅創建費就得 1200 萬兩。而維持新軍一個鎮一年的薪餉、飼料、柴炭、服裝、馬具、醫藥等開支（不含武器彈藥和營房建築），最少又需 130 萬兩，北洋六鎮一年需 780 萬兩。如此

巨額的經費需求，在晚清中央政府不作為的情況下，祇有督撫這樣的實力派才有辦法解決。否則，即使有很好的軍事變革主張，也祇能停留在紙面上。

然而，晚清督撫們所主導的軍事改革又必然是畸形的。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督撫畢竟祇是一地之官，並不能主導全局性軍事變革，因而他們所主持的軍事變革都具有地方性和區域性。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對新式海軍建設雖有過通盤考慮，但實際上也祇能控制環渤海地區，北洋海軍與南洋海軍、福建海軍和廣東海軍長期分立並存，不但分散了清政府的建設資源，而且四支海軍就像鐵路警察一樣，各自防守一定海區，捏不成強有力的拳頭，形成海上機動作戰能力。

其次，地方督撫們通過主導軍事變革，他們的權勢進一步增大，清廷中央權威受到重大衝擊，清廷中央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中央不但不會全力支持地方督撫們的軍事變革，反而總是在想方設法對督撫的軍事變革進行牽制。這決定了晚清軍事變革的最終結局必然是悲慘的。

（三）清朝最高統治者無知無能難以有效指導和駕馭軍事變革

清朝實行的是高度君主專制集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對政治、軍事等方面事務都是一人獨斷、一言九鼎。按照政治學的原理，權大必然責大，權大責大必然要求皇帝是文武全才，而且能力超群。這種情況在開國之初及康熙、乾隆鼎盛之時，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可到晚清時，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不但行政能力弱，連傳宗接代都成問題，導致慈禧太后長期把持權柄，給晚清軍事變革帶來極大的影響。

慈禧擅長玩弄權術，但對軍事變革卻一竅不通。在她的心目中，

軍事變革就是“製器”、“練兵”這樣一些抽象的概念。1875年，她在召見丁日昌時說過這樣一段話：“爾此行到天津，與李鴻章辦理北洋防務，務要和衷共濟，不可各存意見，第一要講求練兵，第二要講求製器造船。”至於如何練兵、如何製器，她一言未發。甲午戰爭以前，她把軍事變革的決策問題交給恭親王奕訢，由奕訢來指導、協調李鴻章等人，總體上雖能控制局面，但根本無法解決軍事變革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甲午戰爭之後，光緒皇帝親政，也想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按照康有為說的“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建議，銳意變革，結果惹翻了慈禧太后。戊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到宮內，召集親王大臣，讓光緒皇帝跪在她的面前，設竹杖於座前，殺氣騰騰，訓斥光緒皇帝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又說：“試問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憤至此！”經此變故，甲午戰爭後這次軍事變革的領導權發生了重大轉移，並極大地影響到後來的變革進程及其所產生的政治效應。

慈禧對軍事變革的無知，還可以從她1907年在清廷決策是否進行預備立憲時的慌張表現看得很清楚。當時，她讓張之洞從武漢到北京，對張之洞說：“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來了，我真是沒有辦法了。今日你軋我，明日我軋你；今天你出了一個主意，明天他又是一個主意，把我鬧昏了。叫你來問一問，我好打定主意辦事。”

更為嚴重的後果，出現在慈禧和光緒兩人同於1908年去世之後。當時，宣統繼位，他的父親載灃攝政，任陸海軍大元帥，掌握全國軍政大權。載灃看到袁世凱手握北洋重兵，急欲收回兵權，於是假軍事變革之名，行回收兵權之實。1909年1月罷斥袁世凱，

1910年8月把北洋六鎮的兵權收歸陸軍部，此前還規定督撫無權調遣軍隊，即使遇到特殊情況也必須先電請陸軍部。一時間，“親貴盡出專政”，蔭昌接替鐵良為陸軍部尚書，載洵為海軍大臣，毓朗任訓練禁軍大臣，載濤管理軍諮府。載灃和他的少壯派集團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權力。可是，軍事變革所造成的兵權實力格局，並不是這樣簡單的處置所能解決的。結果，滿漢矛盾激化了，新軍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造反了，清朝的國運終結了，袁世凱則借此成為最大的獲利者。

總起來看，推動一場軍事變革運動，需要一個完整的軍事改革者群體，應當包括策劃者、決策者、組織者和參與者等四種類型的人。改革能否成功，既取決於改革者的個體素質，更取決於改革者的群體結構。

三、改革者離不開愛國激情，更離不開

利益的驅動和文化的激勵

任何一場軍事變革的發生和發展，都必然有自己的動力源頭。從晚清軍事變革的歷史看，促使魏源、李鴻章等人成為軍事改革者的主要動力，在於他們受到中國對外戰爭一次次失敗的刺激，而制約他們不能在改革道路上走得更遠、他們的改革主張難以被社會廣泛認同的原因，則在於晚清軍事變革缺乏強有力的利益驅動和文化激勵。

（一）戰爭刺激是最基本的動力，但所催生的變革激情難以持久。在晚清歷次對外戰爭與一系列軍事改革思想和變革運動之間，存在著典型的刺激—反應模式。就是中國遭受一次外敵入侵，清軍打一次敗仗，國家蒙受一次屈辱，軍事改革的思想就向前發展一

步。具體說來，有六次戰爭直接推動了晚清軍事變革思想的發展。第一次是 1840~1842 年鴉片戰爭，戰後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是 1856~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戰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提出要搞軍事自強；第三次是 1874 年日軍入侵臺灣事件，清政府受其刺激，發動第一次海防大討論，決定建設三洋海軍；第四次是 1884~1885 年中法戰爭，戰後清政府發動第二次海防大討論，決定設立海軍衙門，加大投入發展北洋海軍；第五次是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戰後康有為等人提出了新的變法思想；第六次是 1900~1901 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戰後清政府決定全面推行新政，開始大規模編練新軍。可以說，打敗仗，吃大虧，是推動晚清軍事變革最主要的動力。

由打敗仗、吃大虧的刺激所產生的變革動力，在本質上屬於一種愛國激情。而激情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來得快、消得也快，它能在很短時間內形成濃烈的氛圍和強大的氣勢，打破舊的平衡，衝破傳統的阻攔，迅速地將改革推向前進；但它也會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平的到來，在生活逐漸恢復常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消退，好了傷疤忘了疼，使改革難以持久快速地向前發展。

鴉片戰爭曾經使道光皇帝受到很大的震動，堂堂的天朝上國被英國幾番戲弄，他十分震怒，非常想有所振作。但隨著戰爭的結束，道光皇帝又恢復了往日天子的從容，把夷人為患的事拋到腦後，根本不思對策。1842 年 12 月，奕山奏報請僱覓外國工匠，在廣東地方製造火輪船，或者直接購買洋人所造之船。道光皇帝批示：“著毋庸僱覓夷匠製造，亦毋庸購買。”1843 年，兩廣總督耆英向道光皇帝進呈外國雙筒步槍和六眼小槍各一支，並建議仿製。道光一面稱讚其為“絕頂之妙品”，一面明確指示不必仿製，說什麼如果仿製，“必成望洋之歎”。當時有人形容北京的情形是：“和議之

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

咸豐皇帝繼位後，他對如何對付海外強敵，也完全沒有放在心上。魏源的《海國圖誌》撰成後，咸豐皇帝至少有兩次接觸到它的機會。一次是 1853 年，武英殿修書處奉旨將《海國圖誌》修繕貼錦進呈。第二次是 1858 年，兵部侍郎王茂蔭向咸豐皇帝建議重印《海國圖誌》，“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然而，咸豐皇帝對魏源在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卻置若罔聞，毫無反應。

《海國圖誌》的影響是典型的牆內開花牆外紅。該書於 1851 年首次傳入日本，1854 年日本政府決定允許在全國公開出售。此後《海國圖誌》以翻刻本和翻譯本兩種形式在日本廣泛流行開來。1854~1856 三年之內，日本對《海國圖誌》翻刻本多達 22 種。日本有識之士爭讀此書，稱《海國圖誌》是“海防寶鑒”，“天下武夫必讀之書”，一些人因此“思想起了革命”。在明治維新前後數十年內，日本翻譯出版《海國圖誌》日文本多達 16 種，使日本一般民衆得以有機會閱讀此書，接受其思想。而正是這些普通民衆，構成了日本推進軍事變革的社會基礎。當時有日本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帝非也夫！”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相隔 20 年，本來是中國軍事變革的一次絕好機會，卻在清朝君臣的迷迷糊糊之中喪失了。日本正是抓住難得的機會，通過明治維新，將軍事變革與政治變革同步推進，很快在軍事上後來居上，並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軍。由此看來，靠打仗來刺激改革，是可以創造一定的機會，但決不能把改革的希望都寄託這一點上。

（二）社會民眾的利益關切度低，提高官兵經濟地位成爲重要驅動力

軍事變革絕不僅僅是軍隊的事，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參與。民衆對軍事變革的反應程度和方向，主要取決於他們的利益關切度。晚清軍事變革與一般民衆利益始終未能建立起正面的積極聯繫，他們對軍事變革總體上漠不關心，軍事改革者們非常孤獨。這是導致晚清軍事變革動力不足的一個原因。

晚清時期，中國經濟形態仍然是傳統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雖然中外貿易額不斷增加，但基本上都是外國商人到中國來做買賣，中國商人走出去的很少。這種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利益指向是對內的，農民最大的願望就是沒有人去打擾他們，讓他們過平安的日子。不像當年的英國商人飄洋過海，到滿世界去做貿易，商船開到哪裡，就希望軍艦開到哪裡；也不像今天的美國企業不斷從國外運回能源，能源基地在哪裡，企業就希望軍隊駐在哪裡。中國農民種田與打仗之間距離非常遠，他們平時對軍隊沒有直接的保護需求，祇有當外國軍隊打進來、家破人亡的時候才感到需要軍隊來保護自己。所以，中國農民在不打仗的時候，往往想不起軍隊，更是不關心軍事變革。他們沒有給改革者以壓力，也沒有給改革者提供支持。

1860 年秋，我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閔專程去南京，向太平天國領導層提出實行新政的七項建議，其中前三項就是“組織一個合乎科學原則的軍隊”，“設立一所軍事學校以培養有才幹的軍官”，“為海軍設立一所海軍學校”。據容閔觀察，洪秀全等人對這種軍事變革根本不感興趣。這就是一批正在打仗的農民對軍事變革的基本態度，它具有典型的象徵性意義。

經濟形態決定晚清軍事變革的動力機制存在先天不足，普通民衆對軍隊的嚮往主要是因為軍人的經濟待遇。曾國藩組建湘軍，大

旗一舉，衆起響應，靠的就是勇丁具有較高的糧餉水平，當時綠營兵每月薪餉祇有 1~2 兩白銀，而且大部分欠發，實際祇能拿到幾錢銀子，可湘軍勇丁少的每月可得四兩，多的達七兩多。袁世凱編練新軍，官兵入伍的積極性比較高，靠的也是連長每月 50 兩、排長每月 25 兩、士兵每月可得 4~5 兩這樣比較優厚的糧餉待遇。然而，通過加薪加餉來提高官兵的從軍熱情，在當時條件下並不一定具備軍事變革的性質，曾國藩編練湘軍就是如此。

（三）傳統觀念是一種惰性力量，成爲制約改革者的絆腳繩

保持傳統能夠使一個國家不會在急速發展之中喪失自我，但傳統又經常表現爲一種歷史的惰性力量，對軍事改革者形成重大制約。1867 年清政府在京師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時，曾發生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就很能說明問題。

同文館是 1862 年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奕訢提議成立的，開始主要是培養翻譯人才。辦了幾年，奕訢等人深感西方之所以船堅炮利，是因為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因而在 1866 年，提出要在同文館下設立天文算學館，從舉人、貢生和科甲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員中招收學員，從歐洲聘請專家講授有關知識。本來，當初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同文館，北京的官員和士大夫就很看不慣，許多人都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看成是一個極不光彩的地方。北京人閒談，說“方今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四要地”。其中的“鬼使”，指的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帶有明顯的貶意。現在，奕訢等人要設天文算學館，一場保守傳統與改革創新的衝突就爆發了。

先是御史張盛藻上奏：“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爲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禮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爲機巧，專用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

接著，同治皇帝的老師、理學大師倭仁兩次上折。第一折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衆鹹歸於夷不止。”強烈要求慈禧太后“立罷前議”。第二折說：“欲求制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今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其志行已可概見。無論所學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力報國乎？恐不為夷人用者鮮矣。”

還有一個候選官員楊廷熙越級上奏，稱洋人是中國不共戴天之仇敵，唯有咬牙切齒痛恨之，學習洋人是奇恥大辱。他列舉了開辦天文算學館的十大罪狀，並把當時北京久旱不雨、護城河水源枯竭、春天起沙塵暴等等，都說成是上天的警示，要求慈禧太后立即取締天文算學館。

在當時的北京城，街頭巷尾也是“口語籍籍，或粘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或作對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更有一副對聯說：“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真可謂群情激憤，人言可畏，許多原來準備報考天文算學館的士子和官員，因此裹足不前。

面對保守勢力的攻擊，奕訢等人感到了極大的壓力。他們多次上折，反復申辯，最後使了一個撒手鐮，才把倭仁等人壓了下去。奕訢向慈禧太后上奏說：既然倭仁認為天文算學館不必請洋人為老師，中國自有“精其術者”，而我們瞪著眼睛找了 20 多年也沒有發現這樣的人才，那就請倭仁保舉人才，單獨成立一個館，並且由倭仁負責督辦。這一下倭仁挨了一悶棍，被狠狠地將了一軍，他哪裡有人才，他又哪肯去辦天文算學館。於是，他祇好不再說話，實際上內心極不服氣，藉口生病長期不上朝。

這次爭論的內容，涉及兩個焦點性問題：第一，中國的軍事自強到底靠什麼？一方認為靠忠信禮義，另一方認為除了忠信禮義，還必須要學習西方的軍事科學和技術。第二，中國人能不能向洋人學習，能不能拜洋人為師，一方說絕對不行，另一方說並無大礙。其實，如果我們站在倭仁的立場上想想，儘管他提出的觀點非常迂腐，但卻是十分真誠的。自宋明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就一直認為，立國的根基在於道德而不在於暴力，所謂“國之存亡在德不在強”，“仁義之師必勝”。而且，在中國人看來，老師就是道德的承傳者，老師是極為神聖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中國人怎麼能夠拜洋人為師、認賊為父呢？可以說，在天文算學館的爭論中出現這兩個問題，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舊性。有差異必然就會發生衝突，重守舊必然就會變成制約軍事變革向前發展的歷史惰性力量。

1978~1998 年間，我在軍科院研究了 13 年的中國近代軍事變革問題，其主要心得比較集中地體現在我所撰寫的《關注與超越——中國近代軍事變革論》一書中。此後，我轉而研究我軍建設和對臺戰略指導等方面的重大現實問題，可經常有很多問題困惑著我，比如到底應當如何看我們今天的軍事變革？

任何改革都是由一定的人、在一定的環境下推行的。如果我們搞清楚是誰在推進改革，改革者所站立的舞臺（也就是體制平臺）是什麼樣子，我們便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晚清軍事變革的歷史，就是為了從歷史中尋找借鑒。當然歷史就是歷史，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歷史與現實進行比對，更不能機械地進行對號入座。現實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現實錯綜複雜的矛盾之中，歷史祇能啟發我們的思維。